

古典文学小丛书

建安七子作品选

7
13.41



87107129

87
I213.41

1
3

建安七子作品选

中州古籍出版社

D

392282

责任编辑 弦 声

古典文学小丛书
建安七子作品选
吴 云

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
郑州市金水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 发行

787×960毫米32开本 3.75印张 64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50册

统一书号 10219·118 定价0.70元

前 言

“建安七子”的名称最早见于曹丕的文章。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璉、东平刘禎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足而并驰。”（《典论·论文》）曹丕称赞“七子”学识广博，文章也写得好，各以其学说、文辞驰骋于文坛，并驾齐驱，不相上下。“七子”的著作，据史载，六朝晚期已有散失，约至宋朝时已大部分亡佚。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佚文多存于明代张溥辑录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这里笔者谨根据曹丕所排的顺序，对“七子”试加评述。

（一）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二十世孙。他的七世祖孔霸做过汉元帝的老师，官至侍中。父亲孔宙（zhòu 昼）曾

任太山都尉。孔融年幼便表现出才华过人。年十岁，随父亲到京城洛阳定居，不久父亲死了。尽管孔融幼年丧父，但他童年时所受的家庭教育以及他自己的刻苦好学，对他后来的成长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孔融二十八岁入仕。他刚刚走上官场，就表现出正直、不畏豪强的可贵品质。当孔融被司徒杨赐辟为属吏时，汉王朝正在发动检举贪官污吏。孔融不仅积极贯彻此事，而且专门揭发大官吏亲友中的贪官。此事使上层官吏颇为恼火，并派人质问孔融，而融则“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汉书·孔融传》，有关孔融事迹的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出本传），使责问者在事实面前只好认输。此后孔融又被征辟为司空掾，在职三天便升任虎贲中郎将。恰逢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立献帝，杀何太后，自任国相。孔融对此事颇气愤，每次议论废立事，均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董卓见孔融反对自己，便将融转为议郎。当时黄巾农民起义军占据各州郡，尤其在北海郡（今山东潍坊）一带的势力最雄厚。董卓不敢亲手杀掉孔融，于是在朝廷上提出建议：让孔融任北海相，想借农民起义军来收拾孔融。孔融毕竟是个文人，他既无军事才能，又缺乏战争经验，与农民军两次交锋皆败北。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不久又升任少府

（九卿之一）。孔融认为“兼善天下”，为国尽力的时机到了，每在朝廷上议论国家大事，他即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孔融在任少府期间除给献帝上书提建议外，还推荐了一些有才华的人。前者如《崇国防论》、《上汉帝书》等。后者如《荐祢衡表》、《荐谢该上书》等。总之，从建安元年到被杀，孔融在献帝周围任职的十二年间，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这是应该肯定的。

论述孔融，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与曹操的关系弄清楚。孔融与曹操的关系较为复杂，既非一向反对曹操，也非“从拥护走向反对”。笔者认为，孔融始则怀疑曹操，继而拥护，最后是反对。孔融怀疑曹操的时间，是他任北海相之际。黄巾军包围了他的住所，在危难之际他宁肯向刘备求援，也不向势力雄厚的袁绍和曹操呼救。理由是孔融当时就认为“绍、操终图汉室”，即要篡夺汉室的权。孔融拥护曹操的时间约为建安元年到建安十年。这是因为孔融看到曹操把献帝迎到许昌，请了许多知名人士（包括孔融自己）共辅国政，实现“唯才是举”的政策，并关心人民的疾苦；加上消灭许多割据势力，初步统一了北方。孔融在这期间，有一些文章、书信和诗歌中对曹操上述业绩均有所歌颂，并将曹操比作齐桓公来加以颂扬。

那么孔融又为什么反对曹操呢？笔者认为，孔

融与曹操的分歧主要在政治方面。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儒家的思想、伦理道德在他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他用儒家正统观念来评价曹操。随着曹操征伐战争的胜利，权力越来越大，献帝已变成傀儡。此时孔融“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在孔融看来，无论董卓还是曹操都想篡权，因此他又走上反对曹操的道路。至于曹操打败袁绍后把袁绍儿媳甄氏送给曹丕，以及曹操征乌桓和曹操提倡禁酒，孔融都站出来反对，这是借题发挥，实质上在于反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孔融的悲剧，在于正统的儒家思想使他不能正确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曹操在当时的进步作用，因而一味反对曹操，终于被杀，还使妻子和九岁的女儿、七岁的儿子也未能幸免。曹操雄才大略，但在杀孔融、祢衡、许攸、娄圭、崔炎等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不能容人和“性忌”的弱点，致使千载后人们一提杀孔融等人，仍对曹操有所非难。

孔融的政绩谈不上卓著，然而他的创作，特别是文章在当时确是名震天下的。孔融的诗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九卷，唐代为十卷。明代张溥整理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孔少府集》只有一卷，有文（包括表、疏、对、教、书、论、议、碑）三十二篇，诗八首。

孔融的文章写得好，在“七子”中，无人能与

他比美。例如《荐祢衡表》，写得颇具文采，用典较多，对偶整饬，散文骈化痕迹较浓。大批评家刘勰论及此文时说“气扬采飞”，评价甚高。孔融文章骈化的特点在“七子”中较为突出。除《荐祢衡疏》外，其他如《上书荐谢该》、《应讯》、《与邴原书》、《与王朗书》等，骈化特点也较浓。他对骈体文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他的《论盛孝章书》，却以散体为主，极少有华丽的辞藻，文章显得自然，读后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孔融文章的最突出特点，可用一个“气”字来概括。关于“气”字的内含，周振甫同志认为指“风格和气质”（《文心雕龙选注》）。他不仅善于写表、疏一类文章，还善于写论辩文章；尤其是讥讽曹操的几篇文章更具特色。鲁迅喜欢孔融的文章，主要是嘲讽类型的，当然这同鲁迅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有关；由此可见孔融文章对后代影响之深远。

孔融现存的六首诗，《杂诗》其二写得较真切。全诗呈现出语言凄婉，哀切动人的特色，颇具建安时代慷慨悲凉的风格。孔融诗能较充分表现他的思想和为人的，当首推《临终诗》。此诗写于建安十三年（208），孔融被曹操拘捕之后临刑之前。作者冷静地回顾一生失败的最大教训是“言多令事败”，即言多语失。他憎恶“谗邪害公正”的社会现实，为此他痛苦着。诗的结语二句是“生存多所

虑，长寝万事毕”。作者临死还在揭露他所不满的社会现实。应该说，他是饮恨而死的。

(二)

陈琳(?—217)，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东北)人。他入仕后第一任官职是任何进的主簿。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同意。于是何进拟用召四方猛将引兵向京城，以威吓太后。陈琳建议何进速决此事，何进不采纳陈琳的建议终于失败而被杀。此后陈琳避难冀州，投靠袁绍，绍即任书记之职。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洋洋长文，即作于此时。袁绍被曹操击败，琳又投归曹操。操任命陈琳为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当时曹魏的军国书檄，多出自陈琳、阮瑀之手。陈琳的最后一任官职是门下督(大将军的属官)。建安二十一年(217)，一次大的瘟疫夺去了陈琳的生命。

陈琳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为十卷，《宋史·艺文志》仍为十卷。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陈记室集》仅一卷，有赋九篇、文九篇、诗四首。

陈琳的赋作，当以《武军赋》为最佳。此赋作于建安四年(199)，袁绍讨伐公孙瓒之时。葛洪曾

给此赋以高度评价：“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抱朴子·外篇》）认为《诗经》中的《出车》和《六月》虽然同是写征伐，但还不如陈琳《武军赋》有气魄。纵观陈琳的赋作，大都和政治有关。就连他的《神女赋》也涉及政治。这也是陈琳赋的特点之一。

陈琳的著作，当首推他的文，尤其是《为袁绍檄豫州》一文最出色。明代张溥分析此文说：“心诚轻之，奋其怒气，词若江河。……后世即有善晋者，俱不及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词》）

陈琳诗作著名者，当首推《饮马长城窟行》。此诗的风格极似民歌的乐府诗。它本是汉乐府《相和歌》旧题。陈琳在这首诗中假借秦代筑长城的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沈德潜论及此诗的表现手法时说：“无问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可与汉乐府竞爽矣！”（《古诗源》卷六）陈琳手笔的妙处确实在通篇采用对话，但却让人感到没有对话的痕迹；仅此而言，不仅可与汉乐府比美，而且超过了汉乐府的许多对话体诗篇。

（三）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

东邹县)人。粲出身名门。曾祖父王龚有高名于天下，顺帝时任太尉。祖父王畅，灵帝时任司空。畅又与汉末党人领袖李膺为好友。当李膺因党锢之祸被杀，王畅也弃官家居。粲父王谦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后因病死于家中。

王粲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渡过的。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之乱，献帝西迁，王粲流浪到长安，时年仅十四岁。当时闻名的大学者蔡邕也在长安。王粲前往拜访蔡邕，蔡邕因为高兴和急于出来迎粲，连鞋子都穿倒了。由于王粲年幼，身材短小，在蔡邕家做客的人都为之惊愕。然而蔡邕认为王粲是个出奇的人才，对在座的宾客说：“此王公(指粲曾祖龚曾任太尉，祖父畅任司空，均属三公的官职)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三国志·王粲传》)王粲十六岁(初平三年，公元192)，王允、士孙瑞等杀董卓，司徒王允建议王粲任黄门侍郎，因时局混乱，粲不到任。同年粲与族兄王凯、友人士孙文始前往荆州刘表处避乱。刘表见王粲身体弱小和放达不拘小节，未能委以重任。王粲在荆州过了十六年寄人篱下的流浪生活。有时为刘表写写书信，如《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有时为刘表撰文，倡导儒术，例如《荆州文学记官志》，阐明在荆州设文学官的重要性。建安十三年(208)，曹

操南征刘表，表病死。王粲规劝刘表儿子刘琮顾全大局，审形势，及早投归人心所向的曹操。刘琮听了王粲建议，降曹。曹操以王粲劝刘琮归降有功，任命粲为丞相掾（曹操的亲随吏员），赐爵关内侯。此后王粲又任军谋祭酒。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自为魏公，晋升王粲为侍中（比二千石），职位算是较高的了。王粲知识渊博，曹操每有发问，均给以圆满回答。由于魏国刚刚建立，旧的许多制度都废弛了，新的制度急待建立，这项重任就由王粲负责。建安二十一年（216）王粲跟从曹操东征孙吴，次年因瘟疫死于征途中，年仅四十一岁。王粲生前与曹丕、曹植在邳下来往密切，共同赋诗作文。

王粲的诗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为十卷，《宋史·艺文志》八卷，然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王粲的著作仅存一卷。

王粲的诗有四言和五言两种体裁。四言诗对汉末国家遭难有较深刻的反映。例如《思亲诗》中向着已死的亡灵诉说着生者的哀痛。而此种哀痛的根源在于“小子之生，遭世固宁”，“五服荒离，四国纷争”。又如《赠士孙文始》中说：“天降丧乱，靡国不夷”。作者以愤怒的感情，批判乱世的现实。王粲对战乱反映最深刻，艺术性也高的，当

首推他的五言《七哀诗》其一。此诗是王粲由长安避难前往荆州时所作。王粲五言诗的又一个内容，是感叹身世。《七哀诗》其二和《杂诗》其四，即是写羁旅之情的。

歌颂曹操的业绩，是王粲五言诗的一个内容。长期割据势力的混战，使王粲逐渐认识到，善于运用贤才，终成统一大业者，只有曹操。为此当他投靠曹操之后随曹军征东吴时，在诗中极力歌颂曹操，《从军诗》五首便是极好的例证。历代评王粲诗，多议其“愀怆”、“苍凉悲慨”，多举其《七哀诗》为建安的代表作，而往往忽视他的《从军诗》。所谓建安诗风，不仅是“悲凉”，更重要的是“慷慨”。慷慨中含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建安时代是大有作为，积极向上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思想就是这一时代统治者的思想，即曹操的思想。曹操思想概括一下就是：为统一天下而百折不挠。能充分表现建安诗风的是曹操，此外在作家中当属王粲了。

通观王粲的著作，是以赋见称的。如果说在建安时代王粲的诗尚不能独冠当代，那么他的赋是无人能与之比美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虽张（衡）蔡（邕）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曹丕这段话主要讲了三个意思：一、王粲以赋见长；

二、他的赋为张衡、蔡邕这些东汉赋作名家所不能超过；三、在王粲本人，他赋的成就高于其它文体。令人惋惜的是，王粲这样著名的赋家，存留至今的赋作仅二十五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已残缺不全。

王粲的赋作当首推其《登楼赋》。《大暑赋》写得也很有特色。曹丕论及的《槐赋》，其艺术性和感染力，都不能与《登楼赋》、《大暑赋》相提并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粲以其卓越才能，精心致力于赋的写作，使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他的《登楼赋》在赋的历史上树立起新的里程碑，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也应该看到，王粲的诗赋中有些属于应制与奉和之作，特别是他投归曹操之后，此类作品所占数量就更多。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王粲优秀的诗赋创作，对促成和丰富“建安风骨”这一时代文学风格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刘勰称王粲为“建安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篇》），对这一崇高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四）

徐幹(170—217)，字伟长，北海（郡治在今山东潍坊西南）人。少年时代的徐幹，是个勤奋苦学的

人。未到二十岁，把五经读得烂熟，博览传记，出口成章，提笔成文。此时适逢东汉乱世的灵帝末年，许多贵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援求名”（《中论·序》），为了封爵。对此社会风俗，徐幹极反感，绝不与这类人接触，并以读六艺之书来娱乐自己的心志。董卓之乱，徐幹回到了家乡。州郡的长官都想让徐幹出来做点事，均被徐幹以病为理由拒绝了。后来曹操出来拨乱反正，徐幹带着病答应曹操的征辟，始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后又任五官将（曹丕）的文学之职。徐幹随操征战五六年，病情转重，于是居于穷巷，安心养病，淡泊无为，恪守儒家的圣贤之道。在曹丕倡导文章要写得华丽之际，多数文人潜心于诗、赋、文等各种文体的写作，以此竞比高下。徐幹见文坛此种情况，决心“废诗、赋、颂、铭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篇”（《中论·序》），以阐发儒道。建安二十二年（217），死于传染病。

徐幹的诗文集，《隋书·经籍志》为五卷。《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亦为五卷。《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没有辑录徐幹的作品。近代丁福保所辑的《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有《徐伟长集》一卷，内收赋九篇，文两篇，绝大部分是从类书中辑录的佚句。另外还有诗三首。徐幹的论著《中论》两卷则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曹丕说

《中论》二十余篇，而《四部丛刊》据双鉴楼本刊行之《中论》为二十篇。唐代所编之《群书治要》，有《复三年丧篇》和《制役篇》，为二十篇《中论》本所无。故知《四部丛刊》所据之明文始堂本《中论》并非全书。

徐幹的赋今仅存残缺不全者八篇。令人惋惜。

徐幹的诗幸存而完整者为《室思》。全诗共分六章，描写一个妇女对久出在外的丈夫的怀念之情。陈祚明论及《室思》时指出：“亦多用虚字，句句转掉，有此健笔方可。如率意学之，易沦卑弱。”（《采菽堂古诗选》卷七）特别是“自君之出矣”四句，是历来传诵的佳句，后代文人写作同类题材时，往往仿效此种写法，形成一种独特的格式。

徐幹的专著《中论》最著名。作者以儒家观点为指导，阐发义理，最终目的是使国家如何才能长治久安。从这个角度而论，它与陆贾《新语》和贾谊《新书》有相似之处。唐太宗所欣赏的《群书治要》，曾收《中论》的若干篇章。曹丕对徐幹和他的论著极为推崇。他在《典论·论文》结束语中说：“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

(五)

阮瑀(?—212)，字元瑜，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幼年聪敏，是东汉大学者蔡邕的学生。建安中期，都督曹洪知阮瑀有才，欲使瑀掌管书记，瑀未同意。后曹操把阮瑀召去担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阮瑀的职务与陈琳相同，又都擅长写檄文。当时曹操的军国书檄，大多出自他两人手笔。

阮瑀的诗文集，《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五卷。《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阮元瑜集》一卷。

阮瑀是以檄文著称的。今仅存《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和《为曹公作书与刘备》两篇。他的文章写得好，而且行文迅速。鱼豢论及此事时曾说：“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注引《典略》）

阮瑀诗较为知名者，有《驾出北郭门》。此题属乐府《杂曲歌辞》。诗的内容描写一个受后母虐待的孤儿的痛苦生活。《杂诗》二首，也写得有特色。张溥评其诗说：“读其诸诗，每使人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阮瑀诗具有建安时